

用理性和良知书写真实的历史

——读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

姜建强

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历史学家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日语原版书题为《昭和史》，筑摩书房2016年）。当准备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笔者闪过一丝疑惑：为什么要翻译出版这位1962年出生的中生代学者的昭和史？论知名度不及史学家阪正康的《昭和史的教训》（朝日出版社），论畅销度更不及史家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平凡社）。但开始翻阅阅读，笔者便被作者的学术真诚和学术勇气所吸引。花了几天时间慢慢读完，感觉这本书最具有意义的是没有迎合被司马辽太郎调弄而成的日本读者的口味，更没有为复苏历史记忆而放弃历史的真。与日本各种版本的昭和史相比较，笔者以为古川的这本昭和史显然是理性的一个高度，良知的一个高度，当然更是生命本真的一个高度。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产生

所谓昭和史，就必然涉及到那场侵华的“15年战争”。对那场战争的被害者和受害者来说，日本和日本人毫无疑问是罪恶的加害者。若遵循一般战后处理方式，用其真诚的“忏悔”以及政治家虔诚的“道歉”，或许就能清理完历史情感。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尤其是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以及不分昼夜的东京大空袭，日本人所遭遇的凄惨痛楚和死亡，使得他们在感觉和感情上总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正如历史学家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设问：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呢？理由之一，加藤认为是“国家甚至无法告诉阵亡士兵的家属，这些士兵是在何时、何地失去了生命的”（参见第304页）。

当然，这里的逻辑前提不能颠倒——被害者就是被侵略者，加害者就是侵略者。问题是即便是加害的侵略者——日本人，国民情感的积淀也会构成战后日本的一个集体历史记忆。

难度在于这个集体的历史记忆又不能面对被害国被害者的“被害记忆”。如何处理这段集体的历史记忆，也就是如何理性地书写这段战争的昭和史。由于复杂的历史记忆（如原爆记忆、大空袭记忆、满洲逃离记忆等）不能明言，那么势必就会在历史书写中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对过去的否定与曲解，呈现出另一种可诅咒的荒唐事和可恶人。于是我们读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日本学者写的昭和史，虽然对本国的国民情感有了个温存有了个缓冲或者有了个寄托，但对被害国被害者来说，可能又是第二次第三次或第N次的被害。这就随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建立，死者的表象也就成了历史表象的一样。如果说历史的重复性是讲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惯性，那么历史的重复则是人世层面的问题，一定是人的判定受了当下视角与在场的影响。但历史又绝非单纯地作表面的循环。当人们还处在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的表象意识中时，“再来一次”的危险度要远远超过原发状态。这也是历史的可怕之处。所以，这也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们再三警告善良人的一句话：“人们呀，我是爱你们的，可你们要警惕呀。”但后人往往是历史的失败主义者。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工作程序就是史学家们要守住底线，书写真实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读古川《毁灭与重生》的价值所在。

日本历史研究的所谓“红线”

先看看古川对侵华战争的书写。比如书写南京大屠杀，这是古川昭和史最为亮眼的地方。在第三章“战争年代：1937—1945年”中，古川干脆就用“南京大屠杀”的文字作为小标题来加以论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最终，仅仅是下笔书写就会令人感到难过的惨剧发生了”。这里，古川毫无掩饰地写上了“30万人”的数字。他这样写道：“占领南京的日军至少屠杀了数万名中国军人和平民，

如果算上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那么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总数可能达到30万人，这就是南京事件，也被称为南京大屠杀。”（122页）古川最终能将“30万人”的遇难数字写入自己的历史专著，在当今的日本史学界堪称第一人吧，其意义绝不可低估。

如果说日本的历史研究也有所谓红线的说法，那么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就是一条心照不宣的红线。翻遍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昭和史著作，大多用“南京事件”的文字来加以处理，连“南京大屠杀”这几个字都隐而不宣，更不用说写入“30万人”的遇难数字了。如在日本有昭和史研究第一人之称、今年1月去世的历史著作家半藤一利，于2004年2月出版的《昭和史》（平凡社）第六章中，他论述“卢沟桥事件”和“南京事件”，对后者起的小标题是“确有‘南京屠杀’，但是……”。半藤想“但是”什么呢？虽然日军进入南京后有“大量的‘屠杀’和各种非行事件的发生”，但是，“像中国所说的屠杀了30万人，以及在东京审判时也这么说，那是不可信的说法”。半藤的学术油滑在这里显现无疑。与古川相比，良知的高下顿然分明无比。还有专攻日本近现代史的学者秦郁彦，他早在1986年就著有《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央公论社）一书。在“大屠杀——否定”与“30万/40万——虚构”的构图中，他还是选择了后者。他甚至嘲讽中国人素有“白发三千丈”的艺术夸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取“4万人”遇害说。虽然他也认定当初日军在南京的各种“大量屠杀”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对此“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向中国人民深深致歉”。他还坚信，“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今后中日友好就无从谈起”（同上书244页）。不过秦郁彦在另一本《阴谋史观》（新潮社2012年）中，记述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好苏联也好都以中国为战场，所能想象的就成了中国成了牺牲品。”（同上书172页）。这里，秦将这个问题技巧地搭上了苏联，想以此表明这并不是日本的孤立现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笔者所阅来看，在日本，堂堂正正不加掩饰地说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30万的，一个是历史学家古川隆久，一个是小说家村上春树（参见《刺杀骑士团长》）。当然，有人会说，数字总是冰冷的总是抽象的，拘泥数字就冷落了历史情感，淡漠了个体生命的鲜活。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就必先给出数字，先给出抽象，然后才能具象化鲜活。如首先要有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首先要有日军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个数字，然后人才会在阅读历史，在震撼、在惊叹这个数字的同时，唤起一种不可抑制的历史情感，自觉地一点一点、一丝丝、一段段、一片片、一个个地追寻历史真相，以警示后人历史悲剧不可重演。而古川所做的就是这

么一份工作。

不再暧昧不再含糊不再轻飘的历史

总结古川隆久的历史书写，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用一种“一目了然”的笔法，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让历史变得不再暧昧、不再含糊、不再轻飘。这种笔法虽然也多少牺牲了历史特有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读起来有时不免枯燥干巴，但还原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情感与历史记忆。对作为战争的被害国被害者的我们来说，阅读古川的《毁灭与重生》，有一种“解渴”之味，有一种迟到的舒然感。只可惜，这样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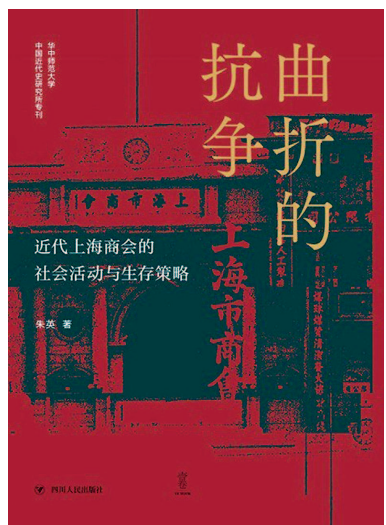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随着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代渐渐消失，一个危机也随之出现。那些对灾难性战争没有恐怖记忆的人，也许会曲折地进入相似的危险领域。“重蹈覆辙”的历史哲学之语就是“历史重演”。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古川隆久这样不断向后人敲警钟的学者。

2010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曾期待日学界有一种“知识共同”的形成。笔者以为《毁灭与重生》这本书，就是一种努力和结果。这本书能及时被引进出版，也显现出一种视野与智慧。而中国读者读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知识共同”的共享过程。

（作者系旅日文化学者，曾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研究员）

近代上海商会的生存策略

王绍贝



《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
朱英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对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十分重视，但近代史视角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史、思想史，近年也重视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对比宏观的政治史和微观的社会风俗史，处在中层视角的民国社会组织也是非常值得加以考察的对象。清末民初，随着专制帝制的土崩瓦解，民间社团、民间组织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春天。既然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作为资产阶级群体最大的社会组织商会，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商会除了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较发达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会馆、行帮、善堂等社会组织，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其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朱英教授这本《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是他近40年来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和商会的重要成果，为我们了解商会在近代中国动荡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发展，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历史另一面。

上海商会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商会，也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最大的商会，被誉为全国“第一商会”。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就下诏书要求设立商会，但直到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推行各项新政措施，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各省商会才得以正式诞生。在以上海商会为主的商人的积极组织下，清末即开始筹设全国商会，遇到辛亥革命爆发而一度停顿。辛亥革命胜利后，受到推翻清朝、民国肇建的鼓舞，上海商会牵头联合全国各地商会，终于在1914年1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商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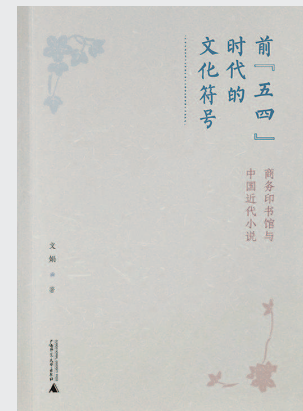
事实说明，上海商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在商言商的社会组织，在重大历史关头，商人也爱国，也曾对历史进程起到重大作用。清末上海商会成立之初，就在爱国商人曾铸的带领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从1882年开始生效的《排华法案》，1905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虐待华人华工的条约，不肯删改苛刻虐待华工条款，于是商人联合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面对美国公使、使领馆的巨大压力，曾铸等商会领导人仍然坚持不改变立场，最终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虽然在动荡起伏的20世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此起彼伏，上海商会和商人们虽欲单纯地“在商言商”，不介入政治，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每次政治风云变幻和政权的更替，都会对商会造成巨大影响，有时候甚至命悬一线。在清末民初，上海商会本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只有服务商人、沟通商情的功能，其组织相对简单，并不掌握社会资源，也无重大权力、利益可觊觎，故而商会初期担任会长、会董，更多的是责任，被推选者甚至并不乐意任职。但进入1920年以后，上海商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而中国近代政治更趋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纷起，甚至与地方军事也不无关联。各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希望拉拢总商会领袖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或者是支持与其联系紧密者登上商会领导人宝座。譬如善于经营政治资本的傅筱庵两次干预上海总商会换届选举，最终在军

阀孙传芳的支持下，破坏商会法以及商会章程，使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但好景不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国民党即以勾结和支持军阀孙传芳的罪名对傅筱庵予以通缉。

国民党北伐期间，曾发动组织商民，共同参加革命，北伐军抵达上海后，就发起筹组上海商民协会，该组织有浓厚的官方背景，连筹备员都由国民党中央委任，其成立得到高度重视。对清末成立的上海总商会和北洋时代成立的全国商联合会，国民党并不信任，早在1928年，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二届第四次全体执监委会议，有提案提出整理民间团体系统，其中就提出取消商会，上海商民协会立即表示欢迎，呼吁政府尽快统一商人组织，而上海总商会和各省商联合会则对此提议坚决反对。1928年10月，上海总商会表示主导下的全国商联合会进行了自选推荐立法委员的举动，意图通过行业界别参政，此举激怒了上海特别党部，使上海特别党部成为当时公开主张取消商会的唯一力量。上海总商会本欲与商民协会并存，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商民协会的不断排挤，意图吞并，于是上海总商会唯有联合全国商会奋起反抗，各地商会函电纷驰，连篇累牍向国民党各级政府提交请愿书，反对取消商会，使得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取消商会的提案最终不了了之。就在大会闭幕后，1929年4月22日，又发生了上海总商会因会客室被占及会所被砸，而被迫“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再次引发激烈矛盾冲突。从清末以来，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上海总商会成立之后虽然遭遇多次重大变故，但从未有过向全社会公开宣布闭门及停止办公的先例。上海总商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对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党部做出回击。上海总商会此举博得舆论同情，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关注，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最终保留商会而取消商民协会。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但商会继续存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又参与了全国商联合会的重建工作。作为近代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商业重镇，可以说一部上海商会史也是一部上海的近代史。



《前“五四”时代的文化符号》
文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商务印书馆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步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探讨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逐渐摆脱了纪念模式，转而从文学史、文化史的历史进程来思考问题。文娟博士的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小说》，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有两个关键已经获得了研究者的高度认同，一是上海；二是出版。小说与上海的关系，在上世纪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团队撰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中，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人们通过小说史的研究，第一次意识到文学史上有海派这样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上海作为一个地域空间，为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价值形态，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的文学价值世界，诗与文的形式，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近代以来，小说逐渐兴旺起来，从一种流行文体上升为主流文体和代表性文体。这一转变，与上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凸起，基本是重叠的。有大量研究材料证明，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小说作品的发表，是在上海，众多小说作者也是到上海来谋求发展。这些材料和文学史现象告诉我们，上海与中国近代小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至于为什么小说家愿意来上海谋生，为什么小说文体会在上海兴旺发达，这其中的缘由，与出版业集中于上海有着密切关系。《申报》最早的征文广告中，明确指出，众多文体中，唯有小说可以获得酬劳。这种商业赢利的稿费支付方式，在给予小说作者以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在文学体制上破除了传统文学的功名利禄的观念。以商业出版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学的生产与写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条新路。

在追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时，以往的做法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事件开始，将前后文学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在商务印书馆研究上，我们看到，印刷出版企业介入文学期刊和书籍的出版以及拉近作者、读者之间关系的现代文学方式，是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提供给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核心要素，是白话、期刊、大学等，那么以商务印书馆为

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

杨扬

代表的文化产业活动，早已经将把这些核心要素融入到企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推广中。这方面内容，在诸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研究中都涉及，只是有的研究者偏向于史料的铺陈，而有的研究者精于要素和观念的提炼。我这样强调商务印书馆研究的特殊意义，是希望研究者能够广泛意识到商务印书馆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文娟博士的《前“五四”时代的文化符号：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在理论上表述上，可能没有特别强烈的诉求，但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借助史料梳理出来的小说史发展脉络，是有助于人们改变对原有的文学史观念的认识。譬如，商务印书馆对于小说出版的重视，很多回忆文章和研究者都提及，但具体情况却是朦朦胧胧的。文娟根据当时报刊的图书广告，统计出早期商务印书馆在小说出版方面的具体情况，这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工作，即便是在大数据盛行的今天，这种统计还是需要专业人员用心研究，才可能有这样的进展。文娟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所以，该书在论述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小说发展的同时，作为附录，是商务印书馆小说出版的编年。这两者对照阅读，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